

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饮食量词训释^{*}

敏春芳

(兰州大学 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 量词是汉语的重要特点之一,研究量词的语法功能及其形成的历史,在当代语言学界是一个重要的热门课题,尤其是近代汉语量词的研究。敦煌文献和吐鲁番文书的发现,从语言的角度来看,给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而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其中敦煌社邑文书(保存了近四百件)就是其中之一。社邑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基层社会组织,从先秦到近代,源远流长。我们对其中的量词进行描写研究,并证之于敦煌其它文献,有助于我们了解敦煌乃至西北地区汉语量词的发展状况。

关键词 敦煌文书 吐鲁番文书 文化 语言学 文学 量词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饼”在中国饮食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没有那一种食物像饼这样强烈地影响了中国的饮食风俗。饼在敦煌出现的时间相当早,虽然现在还不能确定最早的饼产生在西域还是内地,但至迟在汉代,敦煌一地就已有“饼”这是事实。同时饼也是敦煌人的主要食物和种类最多的食品,也是敦煌文献记录最多的食品,有胡饼、蒸饼、煎饼、烧饼、馓子、薄饼、菜模子、馒头等二十余种。^①几乎包括了当时能知的饼家族的所有成员。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及繁荣,这些各式各样的“饼”随着东来西往的商旅驼队、杀伐征战的兵士和各种使节,在敦煌交会、流播,可以说,以“饼”为代表的东西饮食文化,也从敦煌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到了中亚乃至西方。因此,研究敦煌的饼,对研究敦煌的饮食文化具有主要的意义。

敦煌遗书中保存了大量的关于“饼”的记载,有些是普遍流行于中国北方的饼的名称,而大量的则是敦煌当地的食品;更为可贵的是许多文书中在记录各种不同的饼时候,所使用的单位词(量词)也不仅相同,如“薄饼”用“翻”,说明此“饼”的制作方法;“炉饼”用“双”,说明制作的工具和用料的多少;“馒头”则用“栲栳”等等,不仅反映了那个时代敦煌人面食的丰富多样,而且还有助于我们了解汉语量词的发展状况。本文就是对“饼”的相关单位词即量词,作溯本求源的工作。(本

文引例出于《敦煌社邑文书辑校》^②,前边半角圆括号中的序号为本文引例序号,一编到底,不分节编排;其后的阿拉伯数字为社邑文书之编号)。

一、翻(番)

翻 《说文·羽部》:“翻,飞也。”引申为翻动。翻卷。“翻”作为量词,用以称量“饼”,当由制作“饼”时上下翻卷、翻动之过程引申而来,如:

(1) 2 大中年间(八四七至八六〇)儒风坊西巷社社条〔斯二〇四一〕^③

“一所置赠孝家,助粟壹斗,饼贰拾翻,须白净一尺捌寸,如分寸不等,罚麦壹汉斗,人各贰拾翻。”

(5 页)

(2) 37 公元九六七年后(?)张吉昌身亡转贴抄〔斯三〇一一背/5〕

右缘张吉昌身亡,准例合有赠送,人各饼卅翻(105 页)〔以下原缺文〕

“饼贰拾翻”、“饼卅翻”即“二十个饼”、“三十个饼”,

*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 2007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敦煌愿文词汇研究”(项目编号:07BYY044)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敏春芳(1969—),女,回族,甘肃甘南人,兰州大学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在站博士后,先后任西北民族大学语言文化传播学院教授,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字训诂,敦煌文献语言研究。

“翻”作为个体量词的用法,敦煌变文(《伍子胥变文》)中亦有用例,如:

(3)其鱼人乃取得美酒一杯,鱼肉五斤,薄饼十番,饭携一罐,行至船所,不见芦中之士,唯见岸上空船。(变文843)^④

(4)我有美酒一杯,鱼肉五斤,饼有十播,饭有一罐,请来就船而食。(变文852)

“番”作为量词也是由“更代”、“轮流更替”引申而来。《广韵》:“番,递也。”《释文》:“番,更代也。”故“番”有轮番更代之义。“薄饼十番”即“薄饼十个”;例4中“番”作“播”,此乃敦煌俗文学中,因字形相近或音同假借所造成的别字。另外,我们在佛经里也发现了“番”的这种用例,如:“佛问阿难,有残食不(否)?”答言有饼。佛言:“分与乞食人。阿难即付,人人与一番。中有外道出家女,阿难捉饼与,时两番相著去。”(东晋《摩诃僧祇律》)文中上言“答言有饼”下文“人人与一番”,其后承前省略“一番”的中心语“饼”,即“人人与一番饼”。又如:“昔有夫妇,有三番饼,夫妇共分,各食一饼,余一番在。”(萧齐《百喻经·夫妇食饼共为要喻》)

上例中的“饼”或用“翻”,或用“番”来称量,当因其制作过程中需上下翻转,两面轮流烧烤方可而成。其中例1、2、4没有说明是何种饼,例3“薄饼十番”中指的是“薄饼”。有人认为“薄饼”即“春饼”(以菜肉、春蒿等裹食)。^⑤高启安等认为薄饼不完全等同于春饼,它是一种很薄的烙饼,边缘容易干亦可包馅^⑥。既然是烙饼,要上下烧烤熟之,故用量词“番”;若是馒头,则用另一容器量词“栲栳”:

“官键唱喏……丐(改)换衣装,作一百姓装裹,担得一栲栳馒头,直到箫磨呵寨内,当时便卖。(变文1083)

“馒头”据说起源于三国时诸葛亮用面包猪羊肉以代人头,故名之曰“馒头”。我们在敦煌文献中,仅捡到上文一例,所以推测馒头是中原的称谓。

“栲栳”是用柳条或竹篾编成的一种圆形盛物器具。也称笆斗。《集韵·皓韵》:“栲栳,柳器。”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作酢法》:“量饭着盆中或栲栳中,然后写饭着瓮中。”又,唐代卢延让《樊川寒食》诗之二:“五陵年少粗于事,栲栳量金买断春。”“栲栳”作为容器量词,是唐代新兴的用法,此用法虽未在后代书面文献中使用,但在西北方言的洮岷方言、临夏方言中继续使用,笔者家里的栲栳不仅可以盛馒头,也可以用来盛鸡蛋,如:

一栲栳馒头/一栲栳鸡蛋

翻,《汉语大词典》释为量词,犹页,举《旧唐书·敬宗纪》:“诏度支进铜三千斤,金薄十万翻,修清思院新殿及升阳殿图障。”为书证,未为允当。

二、双枚

王力先生认为“翻”表示“行为是多次重复的”;“必须历时颇久才叫‘翻’”。所以刘世儒先生也提出:“它前边所结合的数词绝少是用‘一’的。”刘先生所言正是,以上所举各例中“翻”前的数词为“十”、“廿(二十)”、“卅(三十)”均为整数,若“饼”的数量较少,十个以下者,敦煌文书中则用量词“双”来称量:

(5)116 公元九一一年前后(?)建福转贴抄[伯三五〇三背]

“社司转贴右缘建福一日,人各炉并(饼)一双。粟一斗。幸请诸公等。”(248页)

(6)117 庚寅年(九三〇?)正月三日建福转贴[伯三〇三七]

“右缘准例建福一日,人各炉饼一双,粟一斗。幸请诸公等。”(249页)

(7)122□壬申年(九七三)十二月廿一日常年建福转贴抄[斯二八九四背/2]

“右缘常年建福一日,人各炉饼(饼)壹双,净粟一斗。幸请诸公等。”(260页)

《说文·隹部》:“双,隹二枚也。”“双”的本义为“两只鸟”。其作为量词可用以称量“鸟”,敦煌变文中有其用例:

(8)一双青白鸽,遶帐三五匝,为言相郎道:“遶帐三巡看!”(变文1182)

由“隹二枚”引申为自然成双之物,敦煌吐鲁番文书中胳膊、玉豚、脚趂、鞋等皆以“双”称量,兹举数例:

(9)两脚出来如露柱,一双可膊似盆椽,纔礼世尊三五拜,当时白净软如绵。(变文784)

(10)玉屯(豚)一双,装饰具。(1-207)

(11)脚趂一双。(1-207)

(12)履一双。(1-144)

同时,敦煌吐鲁番文书中非自然成双,但数量为“二”者,亦可与“双”搭配,如:鱼、钗、壁、缕绳、菰、男女等等均可,如:

(13)天知至孝,当寮背下,感出鲤鱼一双。(变文1213)

(14)金钗一双,银钗一双。(1-144,254)

(15)时有董贞秉国政,将壁两双,杂綵千疋,奴婢百人,求欲娶之。(变文1264)

(16)即与我行帐一具,缕绳一双,锦被一张,与我信。(变文1221)

(17)华遂梦中跪拜而受菰。梦觉,即于手中有菰一双,香气满室,而奉其父,父得菰食,其病得差。

(变文 1214)

(18)大王何必多求,贪其男女,若是一双,应难得也。(变文 538)

而“双”作“炉饼”之量词,实属敦煌社邑文书之特例,并未见于他书,兹再举三例:

(19)124 壬申年(九七三)十二月廿二日常年建福转贴抄[伯三三七二背]

“右缘常年建福一日,人各粟一斗,炉饼(饼)壹双,鵬鸢箭壹具,画被弓壹张。幸请诸公等。”(265 页)

(20)125 壬申年(九七三)十二月廿八日常年建福转贴抄[斯二八九四背/4]

“右缘常年建福一日,人(各)炉(饼)壹双,粟壹斗。幸请诸公等。”(267 页)

(21)128 年支建福转贴抄[斯三四五背/1]

“右缘(年)支(建)福一日,人久(各)录(炉)并(饼)壹双。幸请诸公等。”(273 页)

“炉饼”顾名思义就是因为是在炉内煮熟之饼。《清异录》中对“炉饼”有记载:“汤悦逢士人于驿舍,士人揖食,其中一物是炉饼,各五事,细味之馅料互不同,以问士人,叹曰:‘此五福饼也’”。可知炉饼是一种有馅儿的饼,而且馅料各种各样,是将较少的馅料卷入面中,然后压成饼状,一层馅一层面。所以用“双”作为“炉饼”的单位词,可谓匠心独运。

在敦煌文书中,“饼”还有以量词“枚”来称量的:

(22)17 上祖社条(文样)[斯六五三七背/7-8]

“若两驮者,各出餠饼卅枚,酒壹瓮,仰众社破用。”(55 页)

(23)225 辛巳年(九八一)十月廿八日荣指挥葬巷社纳赠历[斯二四七二背/5-6]

“……见付主人油三十一合,饼五百四十枚,又二十,粟两石,柴三十一束(押)。”后文又有“……其赠粟分付凶家,饼更加十枚,斋麦两硕,黄马八斗。”(444 页)

《说文·木部》:“枚,干也。”段注:“毛传曰:干曰枚。引伸为衔枚之枚,为枚数之枚。《诗经·周南·汝坟》:‘伐其条枚。’毛传:‘枝曰条,幹曰枚。’可见‘枚’本为名词,指木(树)的主干。其后引伸作‘衔枚’之‘枚’。在出土的汉代简牍资料中,量词‘枚’不仅保留与本义相关、用以称量树干的用法,其称量范围大大扩大,用以称量服饰、兵器、器皿、食物、动物等。兹各举数例如下:

(24)剑一枚,面衣一枚。(《居延新简》56.86; 52.92)

(25)脯十枚。(《居延汉简甲乙编》157.18)

(26)卖狗四枚;口树一枚(《居延汉简甲乙编》

240.4, 246.40)

(27)鱼五枚;杞二枚。(《散见简牍合辑》763; 946)

至魏晋南北朝时量词“枚”不仅包含了汉代的用法,更扩大至金玉珠宝、瓜果果实、砖土瓦石、建筑物、甚至连人也可称量。^⑦可说是无所不包的量词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吐鲁番文书中^⑧“枚”使用的范围也是相当广泛的,兹分别举例论述如下:

(一)“枚”可用以称量衣着服饰、由衣、裤、裙、至帽、鞋、袜,乃至面衣、手脚护套等等皆可使用。如:

(28)帛绢衫一枚。(1-12)

(29)故绯绫襖三枚,领带具。(1-143)

(30)两党(襦)一枚。(1-47)

(“襦”即“半臂”形似现今之背心。《释名·释衣服》:“襦,其义一当胸,其一当背也。”)

(31)狐皮冒(帽)一枚。(1-78)

(32)故脚袜(襪)一枚。(1-116)

(33)手爪囊一枚,脚爪囊一枚。(1-12)

(二)各种梳妆用品与饰品,如镜奁、梳子、指环、结发、头结等等,皆可以“枚”来称量。如:

(34)竟(镜)敛(奁)一枚。(1-144)

(35)故金银指环六枚,金银钏二枚。(1-143)

(36)故排(绋)结(绝)发一枚。(1-116)

(37)头结一枚。(1-254)

(三)枕头被毡亦以“枚”来称量。如:

(38)鸡鸣枕一枚。(1-370)

(39)故被一枚。(1-116)

(40)故绫被褥四枚。(1-143)

(四)兵器、工具、等什物,如盾、刀子、箭镞、钁、镊、熨斗等,皆可与“枚”搭配。如:

(41)盾一枚。(1-207)

(42)金刀子一枚,偃鸣一枚。(1-370)

(43)口口(钁)一枚。(1-78)

(五)各种不同的容器、斗、瓮、碗、盘、银眼笼等,皆出现与“枚”搭配之用例。如:

(44)斗二枚,瓮五枚。(1-98)

(45)碗十枚,木盘四枚。(1-98)

(46)银眼笼一枚,取把具。(1-46)

(六)其他如钱币、果实、绳索等皆可以“枚”来称量。如：

(47)故金钱百枚。(1-143)

(48)杏人六十枚。(2-115)

(49)椽七十枚,黑索一枚。(1-98)

从上述描述中可以发现“枚”所使用的范围中,已不见其最原始用以称量“树木”的用法,除此之外,“枚”在这个时期仍然是一个几乎无所不用的通用量词。需要说明的是:“枚”活跃的情形在进入唐代开始,便有明显衰落的现象,它仅可与衣着服饰、容器、瓜果、昆虫和其他器物中的少数名词搭配,如:

(50)披子廿枚并是綾。(3-15)

(51)史尾尾铜盆二枚,翟建折铜盆二……(3-26)

(52)景公夜梦见病鬼作二枚虫从景公鼻出,化作二童子,并着青衣,于景公床前而立,递相言语,……(变文1216)

(53)我与他牙梳一枚,白骨笼子一具,金钏一双,银指环一双。(变文1221)

(54)称体实衣三事。葬身锡杖一枚。常持智慧刀剑。逢君眼目即开。(歌辞0550,1039)^⑨

(55)王梵志诗二七0首:“如此银硬穷汉,村村一两枚。”

“枚”在唐代时,其使用范围较前大大缩小,一些新兴量词的出现代替了“枚”,宋代佛教语录中“枚”极少出现,即使有,词的感情色彩也发生了变化,如“枚”可称量人,但带有贬义:

(56)师云:尔是一枚村夫。(普觉831下)

(57)殊不知,浮上座正是一枚贼汉。(普觉840下)

(58)便与一刀两断,叫他利利落落,作一枚白拈贼,到处偷营劫寨。(密菴959中)^⑩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枚”逐渐走向了衰落,直到最后完全让位于“箇”。“枚”发展至今已不出现于口语中,只有在书面语中偶尔沿用,但仅限于计量小的圆形物品,如:一枚戒指、两枚奖章、三枚金币、五枚邮票等,词义范围越加缩小。

三、箇(个、个)

《说文·竹部》:“箇,竹枚也。”“箇”之本义为竹竿。又《说文·竹部》:“个,犹枚也。今俗或名枚曰箇,音相近。又云:今俗言物数有云若干箇者此读。”由此可知,“箇”古作“箇”,今作“个”。“个”作为量词并称量“饼”,属于词义范围

的扩大。如:

(59)19 众阿婆等社条 唐(显庆三年以前)
〔67 TAM74 1/7, 1/8, 1/10, 1/11〕……众阿婆等
中有身亡者……麦壹斗,出饼五箇。……”(62页)

(60)226 纳赠历十世纪后半叶〔伯四0五七背〕……罗员幸粟怪碧绵绫内接二丈二尺。欠并
(饼)五箇……”(447页)

此外,在初、盛唐开始的吐鲁番文书(第三册)以及中晚唐五代的敦煌文书中,“箇(个、个)”在使用范围和语法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可以称量一般的物品,包括梳妆用品、绢帛、容器、工具、钱币等等,例多不赘举,甚至更扩大范围,各种动物,包括飞禽走兽皆可以“箇(个、个)”来称量,如:

(61)梵释天王恒引前,八部龙神皆从后,岂将一箇汗虾蟆,敢当大圣麒麟门!(变文625)

(62)口口已时许,鞠运贞家内有一婢来,不得名,到海员口口曹主遣赁你两、三个牛来,用踐麦。
(3-327)

(63)八万箇小虫来蚕食。遗留白骨及皮筋。
(歌辞0617,1091)

例多不再一一列举。

总之,唐代应是量词“箇(个、个)”发展变化的关键时期,它具有相当强的生命力,一直沿用到现代,在现代汉语中“箇(个、个)”不仅是书面语,而且是口语中最活跃和使用最广的个体量词。(下转第110页) (责任编辑:楚小庆)

① 转引自高启安、索黛《敦煌研究》,1998年第4期,第76页。

② 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③ [斯]:伦敦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斯坦因(Stein)编号;〔伯〕: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伯希和(Pelliot)编号;〔北图〕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编号。

④ 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1983年出版(以下变文同)。

⑤ 《中国风俗辞典》“春饼”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403页。

⑥ 同①,高启安、索黛《敦煌研究》,1998年第4期,第82页。

⑦ 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7-82页。

⑧ 唐长儒《吐鲁番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主要是第一期高昌郡至第二期高昌国),引文括号中为之册书和页码。

⑨ 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0550首,第1039页,下同。

⑩ 此三例来自《大正大藏经·密菴禅师语录》第47卷,大藏经刊行会,1983年版。

结合画面的抽象意蕴或意境,靳埭强笔下这些晕化的红点变化多端,有时如日,有时又是黄色的晕化的方块或泛着银光的新月,它们点醒作品的禅意,发人遐思,引人参悟。

进入新世纪,靳埭强的这种画风逐步酝酿成熟为一种十分独特的东方式抽象写意风格。作于2002年的《似山非山》是这种新抽象写意风格的滥觞,结构画面的山石林泉演化成气势磅礴的行草书法结体,此前用作表意符号的晕化的红点已从画面上消失,使得书法的笔意更加单纯显豁,涌动的云烟加强了画面的动感,巨幅尺寸不唯令此云山书法的骨骼更具视觉张力,亦使作品空间有如一巨大的气场,这种由物理而心理的空间转换,体现了作者对书法美学内涵的深刻领悟。近作《云山意造本无法》等作品将这一风格提炼得更加精纯,更加耐人寻味。

以图画组字的手法本来就存在于中国艺术传统之中,如清代苏州桃花坞的民间年画《姑苏玄妙观》即以各人物、动物、建筑乃至故事场景组成楷书“新雨清流”四字,流行于内地民间的花鸟草虫书对联亦用彩色图象组成书法。将诗、文、书、画融为一体使之互得益彰的做法,更是中国书画艺术自元、明以来的一个久远传统,靳埭强能巧妙地吸收民族、民间艺术营养,翻用诗、文、书、画融为一体的传统,将书法放

大,将云山缩小,以形成一种新的兼具诗意与哲思的观念性水墨画格局,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作为设计家的职业敏感。以汉字及其书写作为创作媒介元素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的一大取向,从谷文达、吴山专、徐冰到邱志杰等各具机杼,表现出各个不同的艺术睿智。靳埭强以其新的书法抽象写意风格“意造云山”,意在强调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差异性,保持文化归宿感,为这一取向又添新格。这表明立足于本土的生存体验,自觉延续传统文脉,巧妙利用民族、民间艺术资源当是全球化语境下中华民族当代文化复兴的一条可行之路。(责任编辑:楚小庆)

- ① 李铸晋《靳埭强——一个最能代表香港文化的艺术家》《艺术得自心源——靳埭强画集》,香港文化博物馆,2002年版,第4页。
- ② 约根·铎林《红点与黑石头——靳埭强的海报及封面设计》,《设计源于生活——靳埭强设计集》,香港文化博物馆,2002年版,第11页。
- ③ 高美庆《现代水墨画家靳埭强》《艺术得自心源——靳埭强画集》,香港文化博物馆,2002年版,第10页。
- ④ 语见《靳埭强随笔——眼缘·心弦》。
- ⑤ 语见《靳埭强随笔——眼缘·心弦》。
- ⑥ 《靳埭强成长的历程(1942-1979)》,第13页。
- ⑦ 皮道坚《全球化与都市化背景下的中国水墨艺术》《社会转型与美术演进》,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356页。

Interpreting JIN Dai - qiang's Modern Water - ink Art

PI Dao - jian

(College of Fine Arts ,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Guangzhou , Guangdong)

Abstract JIN Dai - qiang absorbs the essence of national and folk art and follows the tradition of integrating poetry , prose ,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He enlarges calligraphy and reduces Yunshan Mountain to form a new concept water - ink painting pattern , which , to a large extent , should be attributed to his profession sensitiveness as a designer. With his new calligraphic abstract style , JIN Dai - qiang attempts to emphasize the cultural difference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dhering to the cultural identity adds new characteristic to this tendency. It shows that a feasible way to achieve contemporary cultural renaissance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is to be based on the local existence experience , to consciously follow the traditional style , and to adeptly utilize national and folk art resources.

Key Words JIN Dai - qiang ; artistic creation ; artistic achievement ; modern water - ink art ; calligraphic creation

(上接第204页)

Interpretation to the Food Words in Dunhuang and Turpan Excavated Literature

MIN Chun - fa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 Lanzhou University , Lanzhou , Gansu 730020)

Abstract The quantity word is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 research on its grammatical function and formation history , especially research on modern Chinese quantity word is a hot subject in linguistics. The discovery of Dunhuang and Turpan literature , in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 provides us with extremely rich and precious first - hand materials and Dunhuang Sheyi Literature (almost 400 pieces kept) is one of them. Sheyi is a basic social organization in ancient China with a long history since Early Qin Dynasty. Our descriptive study on the quantity words in it and other Dunhuang literature is helpful for us to know the development of quantity words in Dunhuang and Northwest China.

Key Words Dunhuang literature ; Turpan literature ; linguistics ; literature ; quantity word